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刘少奇

毛主席的大字报.....	(2)
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3)
刘少奇的反革命历史.....	(10)
刘少奇——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13)
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彻底清除以刘少奇为代表 的修正主义路线.....	(26)

一九六七年四月

炮 打 司 令 部

——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写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 澤 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看，刘少奇的丑恶嘴脸！

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在党内组织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大反毛主席，大反毛泽东思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顽固地制定和推行了一条镇压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充分暴露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今天，广大的革命群众已经把毛主席身边的这颗定时炸弹挖出来了，还将进一步把他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收集并整理了一些材料在这里公布，把刘少奇的丑恶嘴脸亮出来示众。

一、大反毛主席，大反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万人大会上说：“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有这个经验，毛主席也这样，在很多时间里在很多问题上也是少数。”（按：狼子野心大暴露，竟敢凌驾于毛主席之上，多么嚣张！）

他还说：清华有一个人贴了反动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就揍他了，一揍他就揍怕了，如果保护他一下，保护他的自由，让他活动，让他多写几条反动标语，多发表反动言论，这并不碍妨大局。”（按：讲话中绝口不提保护真正的革命少数，而借“保护少数”之名，行攻击毛主席之实，居心险恶！）

他在一九三九年原版和一九六二年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诚和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地在党内发号施令，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内的一切，任意打击、处罚和摆布我们的党员。这种人不是真心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斗争，而是党内的投机分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蠹贼！”（按：配合美帝、苏修的反华大合唱，恶毒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赫鲁晓夫如出一辙。）

在八大党章总纲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被修改成：“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给删掉了。（按：处心积虑地诋毁毛泽东思想。）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时说：“……

所以马克思的理论都可以学，能这样学就活起来了，不爬行了，……有的人认为，何必学这些东西？中国的书还读不完，毛主席的书还读不完呢，或至少先读中国的书再读外国的书吧！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按：刘某叫我们不要先读毛主席的书，而要先读外国的书，否则就是爬行，是他贬低和仇视毛泽东思想的一次大暴露。）

二、民主革命时期，害怕革命斗争

刘少奇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一九四六年幻想政协会议实现，企图同敌人妥协。一九四七年在土改中实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路线。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前夕，刘少奇在胜利面前惊慌失措。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中说：“现在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出于我们预料之外，现在不是怕慢了，而是怕快了。太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容准备。”（按：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必然害怕革命风暴，幻想妥协投降。）

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在政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说：“我们采取的保护富农经济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作，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的了，而这是相当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按：富农是革命的对象，富农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而刘某却要长期保存，他的剥削阶级立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有些同志认为农村可以依靠互助组、合作社、代耕队，实行农业集体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村社会主义，是错误的。”（按：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先集体化后机械化的思想。）

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在对杨献珍和侯维煜的指示中说：“要允许有一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工业、地下工厂，要让他们钻空子，当他们钻空子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立即跟上去，……他钻几十万样，我们社会主义也跟上，搞他几十万样。”“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灵活多样性，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呢？”（按：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梦寐以求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还说：“一到资本主义国家什么都能买到”。（按：复辟资本主义望眼欲穿！）

一九五七年他在湖南说：“有人说工人生活好，农民生活差，相差太远了，……工人生活是苦的，工作八小时，空气不好，劳动紧张，寿命也比农民短。”同年他在上海说：“所有城里人下乡去都持这种态度，下乡也是这样讲，写信也是这样讲，没有一个城里人讲我在城里艰苦，睡的是双层铺，吃饭也是饿肚子。排队买不到东西，城里人下乡都不大讲这些东西。”（按：对社会主义制度恨之入骨。）

四、大反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学说， 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一九五六年九月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按：闭口不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蓄意同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所阐明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学说唱反调，与苏修赫晓夫亦步亦趋，大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讲：“今天的资本家也是新的资本家了。”“在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已经把工厂交出来了，除了极少数的分子以外，他已经不愿意反抗社会主义了。”一九五七年三月他在河南省干部会议上说：“敌人消灭得差不多了，资产阶级公私合营了，已经基本上解决。”“如果讲到非无产阶级思想，讲到农民阶级的思想，讲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讲到地主阶级的思想，是讲过去的，是反映了那个阶级存在的时候。”（按：刘某本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大力宣扬剥削阶级的本性改变了，停止反抗了，阶级已经不存在了，麻痹革命人民斗志，以实现其复辟的美梦。）

刘少奇在一九三九年原版和一九六二年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说：“当着党内产生机会主义思想，存在着原则分歧的时候，我们当然必须进行斗争来克服机会主义思想和各种原则错误。但是这绝不是说，党内不存在原则分歧，没有产生机会主义的时候，硬要把同志间在某些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扩大成为‘原则分歧’”。“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对待党内斗争的态度，他们的错误是很明显的。按照这些似乎疯颠的人看来，任何党内和平也是要不得的。他们在党内是没有原则分歧的时候，硬要去搜索斗争对象，把某些同志当作机会主义者，作为党内斗争射击的‘草人’。他们认为党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只有依靠各种错误的斗争，依靠这种射击草人的火力，才能得到灵验如神的开展。”他还说：“因为各种党员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就使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就引起党内许多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分歧和争论，就引起党内的斗争。”

（按：刘某存心抵毁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七年就提出来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这一英明论断。因为他是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唯恐自己和他的狐群狗党被揭露所以对党内斗争害怕得要死，把党内斗争仅仅归结为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反对党内斗争。）

五、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

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中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些问题上，在我们党内也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

题上，我们党内也发生过不同观点的争论。”（按：意指过去党内出现的种种机会主义，特别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不过是观点不同而已。显然是在为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鸣冤叫屈。）

一九六二年初，他在自己所操纵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即五级干部会议上，想把三面红旗当作“历史教训”来总结，说什么：“我们现在来总结前几年的工作，恐怕总结不完，我们后代还要进行总结。”（大意）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说什么：“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还在这次会上别有用心地提出所谓“甄别”问题，明目张胆地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提出：“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里通外国的就可以翻案。”“只要本人提出申诉，领导和其他同志认为有必要，就可以翻案。”等黑指示。此后，一时黑云翻滚，在全国范围内刮起“翻案风”。（按：为反对毛主席并攻击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翻案，首先做好舆论准备。）

六、大搞形“左”实右的四清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破坏四清运动。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前十条”，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唯恐摧毁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于是急急忙忙让王光美搞了个“桃园经验”，并于一九六四年九月根据这个“经验”制定了“后十条”，流毒全国，刘少奇还亲自出马，做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报告，与“后十条”精神一脉相承。在这些黑经验、黑指示的指挥下，大搞所谓“扎根串连”、“人海战术”。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工作组包办代替运动群众，表面上很“左”实际上大整群众，大搞人人过关，掩护了城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形“左”而实右，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破坏了四清运动。当四清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刘又迫不及待地大搞翻案活动，打击贫下中农，为地富反坏右撑腰，进行反攻倒算。

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制定并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支持并维护反党叛国分子彭真泡制出来的反革命“二月提纲”，并把它作为中央文件，流毒全国。企图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纯学术讨论的修正主义轨道！

刘少奇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关于彭、陆、罗、杨反党问题同党外人士的讲话中说：“彭真实际上是我党的副书记，常参加常委会，实际上参加核心领导，这个人有能力，有不少缺点，犯过很多错误，他不懂毛泽东思想。”（按：包庇彭真，一丘之貉！）

一手策划制定所谓“中央八条”，把所谓“内外有别”、“注意泄密”、“坚守岗位”等八条枷锁，套在革命群众脖子上。

毛主席在六月初就说不要派工作组，但刘少奇贼心不死，趁毛主席不在北京，向全国大派工作组，企图镇压文化大革命，用心何其毒也！

北大六·一八事件，张承先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制造白色恐怖。刘少奇、邓小平命令他立即总结成“经验”刊登，在全国推广，并加了所谓“中央指示”，说什么“别处发生了类似情况也要照此办理。”（按：为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不择手段。）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刘少奇派王光美直接插手清华园，并在七月三日发出了三点黑指示：（1）把蒯大富当作活靶子来打。（2）批倒了蒯大富，才能巩固工作组的位置。（3）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资产阶级民主。刘少奇面带笑容地听王光美、刘涛汇报在清华斗争同学的情况。就这样，刘少奇的黑手把清华园内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打下去。（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了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主席七月十八日回北京决定撤消工作组以后，刘少奇在七月二十九日万人大会上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清楚，不太知道，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真心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不懂，党中央其他机构工作人员也是不知道。”（按：影射攻击毛主席，并为派工作组的方向性错误极力开脱。）

刘少奇威胁刘涛说：“中南海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不许对外讲。否则就别跑中南海。”以此来压制刘涛，不许刘涛揭发。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讲话中说：“你们听了我讲要保护少数，主要是保护好人，可能也保护了坏人，保护一下吧，短时间，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一年也可以，材料够了，就作结论，作结果。”（按：企图以“秋后算账”来压制坚持批判工作组的革命少数派。）

八、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

一九六四年以来刘少奇发表有关“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近二十次，跑了十几个省做报告。他亲自组成了一个教育办公室，还打算成立“第二教育部”、“第二教育厅”，来贯彻自己的主张。（按：我们国家只能有一种教育制度，即毛主席提出的半工半读，也即“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刘少奇提出的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双轨制”教育体制的翻版。）

刘少奇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只字不提，他却要教育部搞“马恩列斯论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材料。

刘少奇贪天之功为己之功，把半工半读当作自己的首创，在报告中多次提到半工半读是他一九五八年在天津提出的，有意诋毁毛主席对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伟大贡献。他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全日制学校的改革也要抓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去年春节就提出来了，还没解决，请高教部、教育部准备。如何改革，再开一次会。看不准，千万不要瞎指挥。”（按：请读者注意，这是有意贬低毛主席一九六四年的春节指示。诽谤毛主席在瞎指挥。）

刘少奇胡说什么“半工半读学校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按：突出科学技术，公然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

他一再宣称四小时读书四小时劳动是半工半读最好的形式。他还宣称：“如果机关、学校、工厂经营得好，人的精神面貌就会好，群众的热情就会高。”（按：公然抹杀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根本不提学校领导权问题，否定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英明论断。试问，这样不讲阶级斗争不立毛泽东思想的半工半读和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半工半读有何区别？）

九、吹捧苏修，鼓吹向苏修学习。

一九五六年九月他在“八大”会上吹捧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政策、方针，批判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按：刘少奇一贯的修正主义思想的一个暴露。）

一九六一年刘少奇说：“在全国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要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按：学习苏修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心切如焚。）

并且还大骂我们满足于一知半解，自以为“懂得很多，懒于学习。”警告我们要“力戒满足”，“戒骄戒躁”。（按：刘少奇狗胆包天，竟敢辱骂毛主席。）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在科学院学部委员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他说：苏美“在基本问题上联合起来是不可能的。”“就是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逐渐认识到战争政策未必对美国有利。”（按：赫秃高徒，与苏修烂言如出一辙！）

十、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同毛主席分庭抗礼

长期以来，刘少奇一贯用人唯亲，在许多重要部门和负责的岗位上大力培植亲信，妄图为他最后象赫鲁晓夫那样篡党篡军篡政准备条件。在他领导下的原北方局里云集了：彭真、林枫、蒋南翔、陆平、杨述、周扬、李井泉、安子文、任白戈之类的牛鬼蛇神。

他不遗余力地提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使他近年来飞黄腾达，“红”极一时。文化大革命以来极力包庇彭真，保护林枫。

叛徒彭真和薄一波在北京坐牢时，向国民党自首投降，得到刘少奇包庇。（根据林枫秘书揭发）

十一、宣扬物资刺激，鼓吹金钱挂帅，散布“超阶级”谬论，反对突出政治。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说：“如果不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得比较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按：抹杀突出政治的精神变物质的巨大作用，抹杀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

他还说：“工人农民分配不当就要闹事”，“人民为了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就要过问工资、住房、吃饭、坐车这些事。这就表现出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积极性了。”“你分多了，我分少了，大家不愿意干，生产力就要受到阻碍。”（按：反对突出政治鼓吹金钱挂帅反映出刘某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唯利是图的丑恶的内心世界。）

一九五七年他在湖南对干部讲话中说：“一所电影院盖起来可卖票，还可以赚钱，商店盖起来可以出租给商业部赚钱，开理发馆、洗澡堂，也可以赚钱。”“我是地方政府，你在我这里住，我收地方税，收房产税。”（按：金钱迷了窍，露出了一付资产阶级老财迷的面孔。）

十二、大肆兜售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处世哲学腐蚀毒害青年

一九五七年刘少奇对一些青年同志们说：“总想占人家便宜，不是互利，而是一利，那样关系总是搞不好。”“立志去干几十年工作，最后人民是会了解你们的，照顾你们的。”他在接见民建工商联常务委员指示中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心一意搞个人利益的人，是搞不到个人利益的，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反而会有个人利益，只顾一头反而会有两头。”（按：毒害青年自以为得计，实则暴露了极端个人主义的肮脏灵魂。）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在与王光英一家谈话时说：“我看宁愿吃点亏，……最后大家说你是好人，大家愿意与你交朋友，将来还有大发展。……建立起感情来，就可能有更大的工作要你去作。”（按：堂堂国家主席满脑子只能装下个“我”字，小算盘打得可谓精细。）

一九五七年他在河南许昌学生座谈会上说：“我劝你们回乡后不当干部，连会计都不当……认真地种三、五年地，到那时一切农活都学会了，农民能做的事，你们都能做，比任何农民都不差，你们有文化，农民没有，比农民多一条，再加上一条跟群众关系搞得好的，具备三条就能当乡、县、省干部，也可以到中央，那就看各个人的本事了。……你们是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第一代要得便宜的，参加革命我是第一代，现在成为中央委员，第二、三代象这样就不成了。”（按：好一付理想升官图！可惜你刘少奇现在连中央委员也难当下去了。）

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谈到学生开学时说：“恐怕这样讲一讲（注：就是象前面讲的那些东西），他们下乡种田也就高兴一点，而不是倒霉的下乡种田 垂头丧气的下乡，而是高高兴兴地挺起腰杆子下乡，他会认为我要实现我的理想，则发展前途更好。”（按：以修正主义分子之心度革命青年之腹，可笑！）

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在与王光英一家谈话时说：“只专不红那只一手。不红，即使搞得可以工作，但不能领导。”（按：只专不红的害处只是不能领导吗？原来，在刘某人看来，又红又专就是为了官运亨通！）

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在接见民建工商联常务委员指示中说：“……应该提倡所有党员和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劳动，因为不在于创造多少价值，而在于改变群众的观感，党员干部参加劳动，扫扫地，铲铲土，群众的观感改变了，相应的关系就改变了。”（按：污蔑干部参加劳动为的是博得群众好感。）

《井冈山》编辑部1966.12.30.

刘少奇的反革命历史

《井冈山》编者按：本报今天发表的《刘少奇的反革命历史》一文，是由革命老同志李菁玉揭发的。

李菁玉同志原在北方局工作，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与刘少奇等都有分歧。特别是在一九三七年白区工作会议上，李菁玉等七同志曾联名上书反对刘少奇在会上的总结和重用叛徒，并表示不欢迎刘到华北领导工作。为此大大触怒了刘少奇一伙。终于在一九六〇年因李菁玉同志对农业部以叛徒廖鲁言为首的资本主义复辟进行抵制，新老账一起算，李被扣上“反对刘少奇，反对党中央，个人野心家”等罪名，被刘彭廖一伙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李菁玉同志带来了新生。现李菁玉已回农业部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们希望一切革命干部，坚决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彻底揭发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并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破坏毛主席亲手发动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来已久的。只要我们揭开他的反革命罪恶历史，就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老手。

一、三十年代的刘少奇就是一个扼杀革命群众运动的刽子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刘少奇来到北方任北方局代表，代表中央领导北方局工作。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之后，进一步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而蒋介石反动派却继续执行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卖国政策，集中力量进攻北上抗日的红军，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这时，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英明号召，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活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此时刘少奇在《论职工会工作》一文中，对当时工人抗日救亡运动作了三点指示：第一，罢工没有胜利的把握不要罢。第二，罢工要引起组织暴露的不要罢。第三，罢工只能提当地的经济要求，不能提过高过“左”的政治要求。如“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等。更不能提拥护苏区，拥护红军。请看，刘少奇还让工人革命吗？

毛主席早已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的斗争正在从厂内向着厂外，从经济斗争向着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反日反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现在是在深刻地酝酿着，看样子离爆发的时候已不远了。”毛主席及时地给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期待着工人抗日救亡运动大爆发的来临。

刘少奇不仅不积极领导工人运动，反而用各种条条框框来束缚工人的抗日救亡热情，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压缩在经济斗争中，对于工人运动完全放弃党的领导；对白区工人阶级热爱毛主席，向往苏区的革命心情横加压抑。与此同时，刘少奇还抛出了《论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一文，极力强调合法斗争，而全盘否定非法斗争，使白区工人运动迟迟不能得到发展，严重地破坏了工人革命斗争。

刘少奇对农民运动也同样采取了扼杀的态度。现以当时的冀南农民暴动为例。

冀南地区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红军由陕北东进抗日的形势鼓舞下，发生了武装暴动。暴动的队伍风起云涌，遍及冀南地区十余个县。从经济斗争过渡到政治斗争，进而发展到武装斗争，武装规模很大，组成了华北抗日反蒋第一师，给日寇侵占华北的阴谋一个沉重的打击，大长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志气，大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

大好的革命形势，吓坏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他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在“一二·九”运动来到的前夕，急忙发出三点指示：1.把枪藏起来（插枪不干），2.分散潜伏，3.转移主力到太行山。刘少奇的指示，在当时冀南特委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选择了第二条“分散潜伏”的方法。最后国民党反动派围剿了农民武装，当时二十九军保安司令得意地说：“得钱二万，杀人八百”，一场历时半年（1935·8—1936·2）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暴动烈火就这样被刘少奇这个大混蛋扑灭了。刘少奇的双手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

刘少奇不仅扼杀工农革命烈火，而且把学生运动纳入他的投降主义轨道。

继工农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一万余人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英勇的抗日救国大示威，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宋哲元部队）镇压，革命学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时刘少奇积极指使彭真以领导身份，要学生转入所谓的合法斗争。并且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与日本勾结的反动军阀宋哲元身上。刘、彭等鼓励学生向宋哲元的二十九路军献剑献旗，要宋来领导抗战。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刘少奇、彭真之流一再吹嘘自己在“一二·九”运动中的重大作用，但实际上是个灭火的，把革命的学生运动拉向右转，这一点必须揭穿。

由上可知，被彭、薄、胡等吹捧为“是一个模范”的刘少奇白区工作的策略思想，实际上是一条对抗毛泽东思想，取消党的领导，对国民党反动派妥协屈膝的十足的投降主义路线。刘少奇是一个扼杀白区革命群众运动的“模范”。

二、刘少奇是叛徒集团的祖师爷，是篡党篡政的阴谋家。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以后，“抗日救国”的重担完全由中国共产党担负起来。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敌人监狱里表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情操。

而以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为首的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被敌逮捕后贪生怕死，屈膝求饶，投降变节，以写“反共启事”，“反共宣言”，“反共声明”乞求国民党的“宽大为怀”，完全背叛了中国共产党，背叛了毛主席，堕落为民族的败类，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刘少奇就是这些叛徒的祖师爷，是他亲自指使这些人叛变自首的。

刘少奇之流的叛党，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是与当时国民党反共政策紧紧相联的。

刘少奇早在三十年代就为自己以后篡党、篡政实行反革命复辟积极作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他手下牢牢地控制着两批干部，相依为命。一批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带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干部，另一批是变节自首的所谓“监狱干部”。临汾会议以后，刘少奇到了延安，在他到新四军工作之前，与彭真在一起策划了个大阴谋：当时抗日战争十分残酷，前方干部伤亡很大，党为了长远利益，决定在延安中央党校集训一批干部保存骨干力量，刘少奇乘机，把自己手下的这些干部大批地留在延安或调入延安参加党校集训，以此保存自己的实力，而排斥党的工农老干部参加集训，直到一九六二年刘、邓搞组织结论名单时还定攻守同盟，说：“谁追查就说中央知道”，“这是组织机密，不能告诉你”，以此来包庇叛变分子，为自己的反革命政变保存力量。

三、四十年代刘少奇的反革命勾当

由此可知，刘少奇自加入革命以来，顽固地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革命队伍内部实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时时企图把中国革命拉向右转。刘少奇在四十年代的反革命活动，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但刘少奇及其党羽罗瑞卿，杨尚昆一伙却高喊什么“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国民党不分左中右”等等谰言狂语，取消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取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一九四〇年，我党打退了第二次“反共围剿”，群众纷纷起来减租减息和清除汉奸特务。这时刘少奇等提出了“区无捕人权，县无杀人权”和“杀人反坐”（即杀人者要偿命，杀死汉奸者也要偿命）的政策，压制了革命群众和基层干部对汉奸、特务、恶霸地主的惩罚，大长了汉奸特务的威风，助长了敌人嚣张气焰，杀了我们很多阶级兄弟。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委员。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刘少奇在北方局党校作了《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的报告，对在皖南事变中杀害我新四军的国民党反动派仍抱幻想。他说：“三民主义国民党是一面具有大作用的旗帜，孙中山蒋介石两个国民党的领袖，也同样是旗帜。……如被革命者拿到手里，就是革命的旗帜，……”“因此反对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时候，并不一定要反对国民党。如果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国民党并不一定叛变革命。”他还说什么“汪（精卫）是降日反共，蒋（介石）是抗日反共，前者毫无革命性，后者却不同。”够了，皖南事变，无数革命志士血迹未干，国民党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面目已暴露无遗，而作为当时我党“领导”人之刘

少奇，竟然如此美化国民党蒋介石，不是投降叛变又是什么？在此报告中，刘少奇还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他说：“如果自以为是马列主义者，却不懂战略与策略，是半桶水的马列主义者，而不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学习与掌握马列主义的战略与策略。”孰不知刘当时就是在讲什么“策略和战略”，这就不难看出刘少奇自我吹嘘，公然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的丑恶嘴脸。

毛主席说：“七大”是“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毛主席号召分赴各个战场的同志们“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但是刘少奇却公然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他对要回华北去的代表们说：“‘七大’暂不传达，当前主要以团结对敌为主”，还以什么“不要引起路线之争”来压制要传达“七大”精神的同志。说穿了一句话，刘少奇是为了要继续执行自己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据了解，晋冀鲁豫地区由于在刘少奇、薄一波之流的阻拦下，始终没有传达“七大”精神。

一九四七年，刘少奇在晋察冀中央局会议讲土改政策时说，要派出工作组，组织贫农团，超越党支部，搬石头，踢开区村干部。结果，发生工作组进村后，大抓老干部，关押起来，区公所关得满满的，打击了革命干部，给革命事业带来了莫大的损失。不仅如此，而且在土改初期造成杀人过多的现象。据了解，有的地方把小孩子都杀了，更严重的是，有的地方还杀了自己的阶级兄弟。幸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及时批评和纠正了这些错误，才使“土改”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上面，我们只是揭开了刘少奇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反革命罪行一角，但已经能看出刘少奇反党反人民反毛泽东思想是有历史根源的。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批判刘邓反动路线，把刘邓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刘少奇——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刘少奇罪行调查报告之一

《红旗》（小报）编者的话：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祖师爷——刘少奇，我们北航红旗、北师大《庐山》战斗队、北大《同心干》战斗团、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永向前》战斗队，及长沙市《联盟军》总部的部分革命同志，组成《刘少奇罪行联合调查团》，分赴长沙、益阳二市，长沙、宁乡、湘潭三县调查。在一个多月的调查中，我们和贫下中农，省、地、县、区、社、队有关干部，刘少奇家过去的长工、佃户，进行了广泛接触，举行了多次座谈，了解搜集到一些刘少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料。这些资料，我们将分册编印出版，供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批判。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编印时间又很紧迫，难免有错误，望读者批评指正。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总头目刘少奇被揪出来了。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大好事。为了彻底暴露其反动面目，我们联合调查团到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公社进行了调查。从调查中所获得的大量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刘少奇不仅没有过社会主义这个关，而且连民主主义这个关也未过去。只是一个投机革命，混入革命队伍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是个反革命的两面派。长期以来，他包庇地富反坏，纵容牛鬼蛇神，尤其是在土改运动中，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惜泄露机密，通风报信，出谋划策，对抗和破坏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鼓吹“剥削有理”的反革命理论，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扮演了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卑鄙角色！

一、泄露机密，包庇地富，破坏土改运动

早在一九五〇年土改前夕，毛主席就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反革命修正主义总头目刘少奇在这个革命的紧要关头就露出了反革命的真面目。在土改运动中，他顽固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给他们打主意，想办法，包庇他们，蒙混过关，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派。

（一）通风报信，泄露党的机密

在减租退押和土改运动中，我党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是指导整个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中不少，对地富来说是保密的。当时，我党规定的土改中在外工作的地富子女应采取“回避政策”，就有防止泄密以免给运动带来危害的意义在内。但是，作为当时党内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却无视党纪国法，公然泄露机密。就在土改前后，他接二连三地给地主亲戚写信，透露运动部署。例如减租退押，在后期是有“停止退押”的规定的；但这只是贫下中农内部掌握，地主、富农是不应知道的。然而刘少奇一得此信，即迫不及待地告诉他的七姐（地主分子）：“中央已令各地停止退押，退不起的可以不退了。”公开鼓励他们抗退。

更为严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是在1950年6月28日才通过，而刘少奇在同年5月2日就写信告诉他的兄姐（皆地主分子）“今年秋后”乡下要“分田，不能收租了”。甚至给他们预定成份，吃定心丸，告诉他们“中央已决定今年秋后分田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七哥不会受什么损失。”由于刘少奇的通风报信，给当地的土改运动带来了极大的阻力。

一些参加过土改的同志看到这些信后说，如果他们当时写这样的信，是要开除党籍的。为了维护党的纯洁，我们也必须把刘少奇清除出党。

（二）出谋划策，对抗减租退押

土改前夕的减租退押，是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一次大规模的斗争，是消灭剥削制度的先声。地主阶级对之极端仇恨。他们或者明减暗不减，或者假借无粮，干脆拖欠，千方百计地

加以抵制。

刘少奇的七姐，是个地主婆，解放前，家中有四、五十亩田，全部出租，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她的丈夫当过保长，管过公堂，敲诈勒索了不少财富。在减租退押中，她公开抗拒中央法令，甚至不减租也不退押，恶毒地咒骂农会是“小子会”、“棍子队”。对这样的不法地主分子，刘少奇不仅不揭露其反动面目，勒令她向农民低头认罪，如数减租退押，反而煞费苦心给他们出谋划策，指使地主分子去“请求”农会允许他们拖到“秋季收租时再退”，或者干脆“请求农会免退”。“请求”农会“原谅他们抗拒减租的‘错误’等等，斟酌句，一片苦心孤诣。

刘少奇的这种作法，极大的助长了当时地富抗减抗退的反革命气焰。也给当时干部中产生的“地主无租可退”的错误论调提供了根据，严重的破坏了减租退押工作。在刘少奇的鼓动下，他的侄子刘奠邦（富农分子）至今还欠佃户押金50元整。

（三）包庇地富，破坏土改运动

土改时期，是刘少奇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嘴脸大暴露的时期。

土改以前，刘少奇就千方百计地通风报信，想使其地主、富农分子的哥哥、姐姐们，暂时“不要收租放债”，企图蒙混过关，逃避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逃避广大贫下中农对他们的斗争（也即刘少奇所谓的：“农会就会来找你们的麻烦”）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地主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的哥哥、姐姐们丝毫不肯放弃（那怕是暂时的）对贫下中农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在大革命的洪流即将荡涤这旧社会的一切时，刘少奇出于反动的本能哀叹道：“我也没办法了”。

刘少奇的七哥刘作衡，解放前有田四十五亩，自己不劳动，完全雇工耕种，是附近有名的恶霸地主。但刘少奇却竭力包庇，划框框，定调子，胡说什么“七哥大概要算富农”。由于刘少奇的压力，刘作衡竟只划成“富农”。但是，广大贫下中农的眼睛是雪亮的，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包庇极为不满，在复查时提出：“刘作衡不划地主，我们不复查。”最后，县委派了五个工作组突击难点，才把刘作衡的问题解决。然而，刘作衡仗着背后有人，有恃无恐，听说群众要划他为地主，破口大骂：“我家革命，算得一个，这些王八兔子贼，搞到我们家里来了，一顿棍子。”公然威胁群众：“这些家伙，我到北京走一转，是要几个脑壳的！”他甚至拿着刘少奇的信，气势汹汹地质问当时的副县长：“刘少奇难道不懂政策，他说我家只能划富农，为什么要把我家划地主？”狐假虎威，不可一世。在斗争会上，其反动气焰更为嚣张。他拉大旗作为虎皮，故意把刘少奇送的皮袍穿在身上。群众要他跪，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还要跪？”要脱他的皮袍，他胡说：“这是主席送的。”极不老实。他还把斗争他的群众按1、2、3排队编号，妄图将来打击报复。在刘少奇的包庇纵容下，刘作衡长期拒绝改造，到处胡作非为，为非作歹，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刘少奇的侄子刘奠邦，解放前自己不劳动，依靠出租土地为生，定为富农已属宽大，但刘少奇仍感不满，以未能包庇为憾事，不顾当地群众的呼声，于土改之后，仍写信给刘奠邦，说什么“奠邦家固不种地，出租土地，虽生活不好，人家亦评为富农，但以缺乏劳动力为理由，或可请求定为小土地出租者。”公开煽动牛鬼蛇神闹事，反扑土改。只是由于广大贫下中农的强烈要求，其阴谋才未能得逞。

刘少奇这一系列的罪恶行为，归根结底，正如他自己所说就是为了“你们好”，（“你们”，指其地主兄姐。）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不遗余力地为其通风报信，出谋划策，大长地富反坏的威风，大灭贫下中农的志气，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的土改运动，在当地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损失。这是刘少奇对党对人民欠下的一笔账，这笔账我们一定要清算。

二、纵容恶霸地主刘作衡为非作歹

刘作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刘少奇的亲哥哥，一个有血债的恶霸地主，一个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早在解放以前，刘作衡就曾经霸占了一个贫农妇女达十余年之久，逼使其丈夫上吊自杀。土改时，在刘作衡的再次逼迫下，这个贫农妇女也投塘自尽了。刘作衡就是这样逼死了两条人命。

刘作衡还当过“义仓”的仓长。“义仓”实际上是不义的。刘作衡利用“义仓”的名义残酷地剥削贫下中农，用“义谷”作生意，无耻地贪污、吞没“义谷”。每逢时荒暴月，刘作衡还用这些贫下中农自己积下备荒用的“义谷”大放其高利贷，一心想置贫下中农于死地。

刘作衡的罪恶令人发指。贫农王仁和，不愿意把猪卖给吃肉不出钱的恶霸刘作衡；但刘强行要买，并且声称：“如果你不把猪卖给我，我就把你的猪打死！”你看刘作衡多么穷凶恶极！王仁和无奈，只得含着眼泪把猪卖给了刘。然而，当王向刘要钱时，刘破口大骂，恶狠狠地说：“站着放债，跪着接钱！”硬逼着王仁和跪着去接钱。从这里可以看出，恶霸刘作衡骑在贫下中农的头上作威作福到了何等地步！

刘作衡爱钱如命，无孔不入。即使是办红白大事，乞丐挨门逐户讨一点钱，也要经过刘作衡的罪恶的黑手，不扒掉乞丐一层皮他睡不着觉。

刘作衡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所以花明楼的贫下中农，用“害人害到底，杀人割断头”，这样生动的语言来刻划刘作衡的丑恶嘴脸，来形容他的阴险和狠毒。这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刘作衡不仅是一个恶霸和淫棍，而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去年八月，他在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就医时，竟敢造谣污蔑、恶毒地攻击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公然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张目。他胡说什么：“刘少奇是苏联马列主义学院毕业的。毛主席的位置是刘少奇让给他的，本来头一次选举就是刘少奇的。”而在湖南省人委参事室批判斗争地主分子刘作衡时，他自己供认，这是刘少奇给他讲的。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刘少奇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制造流言蜚语，提高自己，贬低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用心何其毒也！除此而外，刘作衡还无耻地造谣，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光美“又漂亮又能干”，“比江青还能干”。在三年困难时期，刘作衡还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高唱什么“包产到户才能解决问题”，他并不打自招地说：“早在五七年我就主张包产到户了。”

凡此种种，充分地暴露了刘作衡的反革命丑恶嘴脸。

然而，刘少奇，这个窃据国家要职的所谓“共产党员”，又是怎样对待这个恶霸、淫棍兼反革命的亲哥哥的呢？

一句话：关怀备至，狼狈为奸！

还在解放前十年，刘少奇就把自己名下的田产（全系压榨农民而来）送给了刘作衡，以便扩大其家业，增强其剥削能力。

一九四九年，刘少奇窃据了国家的副主席以后，为了不忘地主阶级的栽培，又用高头大马兼火车把刘作衡迎来北京，安排在招待所里，以上宾之礼相待。让刘作衡吃小灶，进出都用小包车，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享尽了人间豪华。就这样住了一个多月。到刘作衡临走之时，刘少奇和这个恶霸难舍难分，并排坐着照了一张相，鼓励他回家开钨矿；送给他皮袍、绳子衣、鞋子、帽子、人参、高丽参；并专门派了一个名叫张长生的连长护送刘作衡回湖南老家。请看，刘少奇为地主阶级尽忠尽孝到了何种程度呀！

土地改革时期，刘少奇又事先为刘作衡通风报信，把党和国家的机密泄露给他。并为其运筹帷幄，划框框、定调子，硬把刘作衡由地主降为富农，公然破坏土地改革运动。

在刘少奇的包庇纵容之下，刘作衡在土改中极不老实，顽固透顶，气焰十分嚣张。公然叫喊要割掉贫、下中农的“脑壳”！他曾先后到长沙和北京告状，企图反攻倒算。

除此而外，刘少奇还大力支持刘作衡办钨矿、建窑厂。不仅口头上同意，而且写信给以鼓励。

刘作衡一见有这样硬的后台，欢喜若狂。他拿着与刘少奇合影的照片，带着刘少奇给他的书信到处招摇撞骗，威胁利诱，开始了他的新的罪恶活动。

一九五〇年，刘作衡与另一个名叫杨咏农的恶霸合伙到衡山开钨矿，湖南省委批给他们一笔预备金；刘作衡公然吞掉了这笔人民的财产。

一九五一年，刘作衡在刘少奇的允诺之下，又开办起砖厂来。他先后承包了长沙市粮食局和中南区后勤部的红砖任务，装出一副要为国家效力的样子。然而为时不久，他就把大量资金抽出，逃回家，致使国家的建设任务完不成，工人的工资也无法发，引起了群众的公愤。长沙市人民法院几次传他到案，他都拒不到案。

人们不禁要问：刘作衡为什么竟敢如此胡作非为呢？他的背后有谁在包庇、纵容和保护他呢？

这人不是别人，这人正是刘少奇。是刘少奇为他开拓了胡作非为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刘少奇把刘作衡介绍给邓子恢，要他去湖北与邓联系。

一九五二年，刘少奇又给王首道写信，要他“招待”刘作衡“数日”，并为其二哥（富农）减少公粮。

刘作衡对新社会极端不满。对抗和破坏国家的征购计划。对这种反革命的活动，刘少奇竟然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什么：“这恐不完全是地主阶级的叫嚣”，还认为党和政府有“加以考虑的必要”。当时国家经济还处于很困难的时候，而对于这样一个地主恶霸刘作衡的孙子，却要国家免费替他培养读书。重新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这也不难看出，刘少奇为了培养地主阶级的接班人，重新掌握大权，也真是费尽了苦心。

于是刘作衡认识了两湖的“显要”，为他以后干一系列坏事开辟了道路。

一九五三年，刘作衡从贫下中农那里索回了皮袍，并从宁乡县勒索了三十元钱。

同年，刘作衡又利用刘少奇的淫威，在湖南省委搞到了一百五十元的“生活补助”。

然而，刘作衡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不久，他又先后写信给湖南省委及省长程潜，大

叫土改后“生活奇苦”，无法“度过难关”，“要求给一碗饭吃”。

在刘少奇的淫威笼罩之下，在刘作衡的多方钻营之下，恶霸地主刘作衡终于钻进了湖南省人委参事室，窃据了二十级的秘书，十几年来什么工作都不做，每月净拿人民的血汗六十余元，并给他从事新的罪恶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同样，富农分子刘奠邦（刘少奇之侄）也利用刘少奇的淫威混进省参事室，任十六级参事，每月诈取人民血汗100余元。

在刘奠邦到北京找刘少奇时，刘少奇对这个富农分子不仅亲切招待，临走还送20元钱，真可谓关怀备至。

刘少奇在57年回长沙时，把一窝6、7个地富分子用小吉普接到豪华的省交际处，团聚一堂，盛情招待。

以上的材料不难看出，刘少奇和地、富分子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对地、富分子的生活、政治是何等的关心，对地富分子的事情是何等的着急。

但是他却在给贫下中农的信中说什么：“刘作衡，刘登候以及还有我的一些亲戚，他们都是地主，……，我也历来同他们不对，他们也历来不听我的话。”摆出一付正人君子的面孔，看起来和地富的界限是多么的清楚。

正反对比，不完完全全暴露了刘少奇当面是人，背后是鬼，阴一套，阳一套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吗？

刘作衡和刘奠邦完全是倚仗刘少奇的权势钻进省人委参事室的，而刘少奇却拒不认账的大搞反革命两面手法，无耻地向花明楼的贫下中农表白说：“此事我不知道，听说后我觉得不好”。这真是贼喊捉贼，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刘少奇爱的是什么？恨的是什么？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早在一九五〇年，刘少奇在给一群地富分子的信中，就很坦白地承认：“我写这封信还是为了你们好”。

四九年八月，在他二哥刘云庭（富农分子）病死之时，刘少奇又迫不及待地送去了輓联，祝愿他“千古”。

一九六一年，刘少奇回湖南时，他特地步行去看望他的地主姐姐，送糖果啦，送粮票啦，送毯子啦，关怀备至。王光美对这个地主婆更是情味相投，六一年同她紧抱合影；真算是一个藤上的黑瓜。一九六二年还给她寄五十元，作为他家养猪致富的“本钱”。

一九六一年对他已死的地主妈，他同样不能忘情，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他特地跑到他地主妈的坟前凭吊了一番。并亲自在坟的四周插上了松枝，表示他的孝心，真不亏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综上所述，可知刘少奇的反动阶级立场没有丝毫改变，他与刘作衡等完全是一丘之貉，他做到了一个封建余孽能够做到的一切。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刘少奇的丑恶咀脸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让刘少奇——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见鬼去吧！

三、鼓吹剥削有理，鼓励地、富继续残酷剥削农民

一九四九年秋，人民解放军进驻宁乡，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在宁乡的罪恶统治，长期被

封建地
总攻击
的革命
酷剥削
正主义
日给他
今年雇
敢抵拒
“雇请
作”，
供理论
他说：
反
务的，
产，反
文
是有如
雇
是保护
人，不
不相
“雇
来，
削有
站在
落后
早已
堪的
下找
关系
地主
不打
反映

封建地主踩在脚下的贫农、下中农站起来了，他们举起革命的火把，向封建地主阶级发动了总攻击，夺了他们的权，强迫他们减租、退押，要求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地主经济。在熊熊的革命烈火面前，刘家兄弟姐妹一伙地主、富农分子，他们既不敢象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残酷剥削农民，又不愿放弃剥削，参加劳动。正在他们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时候，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祖师爷——刘少奇，给他们抛来了救命草，投来了救生圈。他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给他七姐的信中毫不隐讳的说：“你们以及其他的人家，还可以雇长工、短工作事。六嫂今年雇人种田是好的。四嫂亦可雇人种田。”刘少奇唯恐他的哥哥、姐姐们挺不起腰板，不敢抵挡革命洪流，竟从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理论宝库中拾来几件破烂，给他们壮胆。他说：“雇请工人种地，这是可以的，合法的”。“因为允许雇人种地，乡下找工作的人才才有工作”，“对穷人也是有好处的”，等等。刘少奇明目张胆地为地主、富农继续剥削农民，提供理论根据，制造舆论。

阴险毒辣的刘少奇，为了使他的哥哥、姐姐作剥削农民的死硬派，还对他们进行恐吓。他说：“你们必须听我的话，老实照办，否则，你们还是要讨苦吃的”。

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总头目——刘少奇这一套反动主张，绝不是仅仅为他的哥哥、姐姐服务的，而是为整个地主、富农阶级服务的。他说：“可以告诉乡下的亲故们：为了进行生产，尽可雇请长工、短工，讲好价钱，订好合同，以后按合同待遇工人，就不会有问题。”

刘少奇为地、富剥削农民进行辩护，玩弄的手法是：把雇工剥削说成是合法的，对穷人是有好处的。我们必须彻底批判这种地主阶级的反革命理论。

雇工是合法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我们无产阶级的法是保护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它的精髓是造反，是革命，是要彻底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以及产生压迫、剥削的根源。因此，雇工剥削和无产阶级的法律精神是根本不相容的，完全对立的。我们有哪一条法律规定“雇请工人种地，是合法的”呢？刘少奇说“雇请工人种地是合法的”，只能是合地主、资产阶级的法，绝对不合无产阶级的法。

毛主席说：“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刘少奇说雇请工人种地合法，就是承认剥削有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翻过来的旧案，完全翻过去了。这恰好清楚地说明刘少奇是一个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

雇工对穷人是有好处的吗？地主是靠榨取农民的血汗养肥的，封建制度是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总根源，这已是普通常识了。地主阶级手里那面写着“是地主养活了农民”的破旗，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无人挂齿。刘少奇为了替地主、富农卖命，把地主阶级那面破烂不堪的黑旗从垃圾堆中拾起来，苦心修补，抹去“是地主养活农民”，换上“允许雇人种地，乡下找工作的人才才有工作”，“对穷人是有好处的”等等。他以为把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剥削关系，歪曲成地主、富农同农民的互利关系，就可以掩盖地主、富农剥削农民的实质，维护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剥削。其实，恰恰暴露了他是地主阶级的忠实辩护士的丑恶嘴脸。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刘少奇的思想打的是哪一个阶级的烙印，他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反映哪一个阶级的要求，替哪一个阶级说话，为哪一个阶级作事，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写到这里，就不难理解刘少奇为什么会在六四年大搞什么合同工制度，把工人阶级分成

三、六、九等，在政治上压迫工人，在经济上剥削他们，扩大三大差别，极力推行资本主义复辟。这种维护剥削制度的思想是一贯的，是由他的反动的世界观所决定的。

四、刘少奇犯罪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

刘少奇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绝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厚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刘少奇之所以疯狂地反对土地改革运动，长期包庇地主、富农分子，任其招摇撞骗，继续剥削劳动人民，正是由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

刘少奇出生在一个剥削家庭，他家不但收租，雇工剥削贫下中农；而且还管公堂，从中舞弊，对农民进行榨取。刘少奇从七岁到二十岁一直是上学读书，长期受封建地主阶级教育。就在这一时期，刘少奇的剥削阶级意识，剥削阶级的人生观已经形成。刘少奇在中学读书时，就曾对自己家里人说：“你们现在送我多读点书，将来会有报酬的，能挣很多钱，会还你们的。”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年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找到了解放中国的新道路，很多革命者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去。这个时期的刘少奇，为了将来能升官发财，便大搞政治投机，混进了革命队伍。一九一九年他混进留法预备班，一九二一年他又去上海留俄预备班，并且钻进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十月去莫斯科，并在莫斯科入党。刘少奇虽然被卷进了革命的潮流，参加了革命，但是，他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丝毫没有改变其剥削阶级立场的假革命者，是一个投机分子。一九二一年左右，刘少奇曾寄给他的兄弟洪赓飏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的背面，刘少奇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赤裸裸地暴露了刘少奇投机革命的丑恶灵魂。他在诗中写道：“一生富贵何可期，胡不及时以行乐？”从这里，证明了刘少奇参加革命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是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恰恰相反，他完完全全是为了自己能“一生富贵”，能“及时行乐”。我们知道，为了“一生富贵”和“及时行乐”而生活的人生哲学，是极端反动、极端腐朽的剥削阶级人生哲学，就是这种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浸透了刘少奇的灵魂。虽然如此，他为了搞投机，表面上又不得不装出一副革命的样子。然而，他所干的革命工作，和他的个人目的是水火不相容的，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所以，他苦恼，他迷茫，他绝望地问自己：“汝何悲愤而长忆？”

“飘零千里，备罹万难欲何为？”最后，他自己想“通”了，他认为干革命是又蠢又傻的事，于是他哀叫道：“满目带愁思，意蠢情亦痴。”刘少奇的这种真实思想，不向党交代，不向自己的同志暴露，却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的知己朋友洪赓飏。洪赓飏是个什么人呢？据我们初步调查，洪当时是湖南洪江陆军稽查处处长，官僚地主家庭出身，是一个反动官吏。一九二五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捕入狱，洪赓飏便不辞辛苦，想方设法把刘少奇从狱中“保”了出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和敌人打得火热的刘少奇是个什么东西。不是就很清楚了吗？我们可以断定，象刘少奇这样的软骨头，当时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逃跑，变节或投降敌人。

一九六〇年，刘少奇在同大资本家王光美一家谈话时，又一次暴露了他的丑恶灵魂。他说：“我们加入党，是看个人利益横竖解决不了，光解决国家利益，国家社会问题解决了，个人问题也解决了。随着大家利益的提高，个人利益也会提高。”这里，刘少奇所谓先解决“国家利益”、“社会问题”，不过是个招牌，不过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的一种手段，最终仍是为了“解决个人利益”。事实证明刘少奇也是这样做的，据其亲侄刘冀邦说，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这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刘少奇大发国难财，贪污了明朝制作的贵重古瓶4个，最好的一个价值银洋1000多元。将此事和王前同志所揭发的刘少奇在三七年贪污党费一事相连，可以看出刘少奇的灵魂是何等肮脏。

事实证明，刘少奇抱着能“一生富贵”、“及时行乐”的极端卑鄙的个人目的混进革命的队伍以后，虽然经过四十多年，并且爬上了党的第一副主席的位置。但是，他的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场，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目的，并没有丝毫的改变。而且，竟然发展到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地步，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在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上，就公然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

写到这里，我们对于刘少奇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刘少奇为什么在土改运动中，泄露党的机密，替地主家庭通风报信，出谋划策，阴谋破坏土改运动；对于刘少奇为什么竟然多年包庇血债累累的政治反动的恶霸地主刘作衡；对于刘少奇为什么在解放后竟提出“剥削有理”的极端反动的谬论来为剥削阶级继续剥削贫下中农提供理论根据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这是由他的剥削阶级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是有其深厚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结 束 语

刘少奇这样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由于他精通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骗人的“修养”；懂得“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资产阶级的赚钱道理。由于他一贯玩弄两面派手法，阴一套，阳一套，打着“红旗”反红旗，因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隐藏了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

但是，假面具总是要被揭穿，狐狸尾巴总是要露出来的。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震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刘少奇终于落网了，刘少奇的反革命嘴脸终于被彻底揭穿了。刘少奇这个钻进党内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终于被揪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大快人心的大好事！

但是有些人，比如陶铸这个大坏蛋，看到刘少奇解放以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被揭穿了，他们便迫不及待的向刘少奇抛出了救生圈，说什么刘少奇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民主革命时期“还可以”等等等等，妄图以攻为守，死保刘少奇。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革命家”吗？他在民主革命时期“还可以”吗？不！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从来都不是一个革命家，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一个政治投机家，阴谋家，个人野心家；他是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头号代理人；他是中国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祖师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虽然被揭穿了，但是，刘少奇多少年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没有彻底揭露出来，党内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刘少奇没有被揪出来，刘少奇这条黑线还没有彻底挖掉，刘少奇的反动影响还没有彻底肃清。因此，我们向全国革命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

我们一定要宜将剩勇追穷寇，狠打落水狗，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刘少奇的滔天罪行，把刘少奇彻底斗倒斗臭，并且强烈要求把刘少奇从党内清洗出去！

最后，让我们高呼：

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把刘少奇斗倒斗臭！

刘少奇从党内滚出去！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刘少奇罪行联合调查团

附 件 一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刘少奇给他七姐的一封信

七姐（系地主分子——编者注。下同，不再注明。）：

你三月初九日写来的信，我收到了，并看懂了。

你家过去主要是靠收租吃饭的，是别人养活你们的，所以你应该感谢那些送租给你们，养活你们的作田人。人家说你们剥削了别人，那是对的，你们过去是剥削了别人。乡下现在要减租退押，也是对的。你们应照减照退。你不能骂人，说他们是小子会、棍子队。不，他们是养活你们及其他许多人的大恩人，你应该尊敬他们。

你现在退不起租押，人家要你吃点苦，也是应该的。你知道乡下的贫农、雇农吃了多少年的苦，你现在吃这样几天苦，又算得什么呢？老早我就向你们说过，要你们不要收租放债，你们不听，并且还说我不对。现在你们吃苦了，再来找我，已经迟了，我也无办法了。这些苦，照我来说，是你们自讨的。你再不能怨恨别人。

二五减租及三七五限租，是人民政府的法令要办的，你们必须老老实实照办。去年你们没有照办，是不对的，所以现在要退租。如果你们退不出，可以请求乡农会允许你等到今年秋季收租时再退，你可打一个借条给农会，请求农会原谅你们去年没有减租的错误，如果农会要罚你们去年未减租的错误，你可以请求他们罚一点谷，在秋后交给他们。大概今年秋收，你们还可以收一年租，是合法的。但今年秋后乡下如果分田，明年就不能收租了，如不分田，明年还可收租一年。

退押的事，你们已退出一些，如再无法退，可请求农会免退。中央已令各地停止退押，退不起的，可以不退押了，到秋后，你们把田山屋宇交给农会分配就是了。但你们必须把田山屋宇及树木等等好好保存，不要损伤，犁耙锄牛好好保护，不要破坏和出卖。否则，农会

在以后还会处罚你们的。

你们以后应该劳动，自己作田，否则，你们就没有饭吃。今年，如果佃户和农会愿意让几亩田给你们作，你可请求佃户和农会让出一点田作。如果农会佃户不肯让，你们只有揽零工作，或将家中的肥料送给佃户，帮助佃户伙种，请求佃户把多收的粮多分点给你们，作为你们肥料和人工的报酬。在今年分田以后，农会还会分几亩田给你们自己作的，以后你们就作田吃饭。

你们不要来我这里。因我不能养活你们。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者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你们过去收租吃饭，已经给了我这个作你老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耻辱，也给了你的子女和亲戚以耻辱。你现在自己提水作饭给别人吃，那就是给了我们以光荣。你以前那些错误的老观点，应完全改正过来。

你把我这封信送给六姐一看（六姐亦系地主分子）。他家也不作田吃饭，而靠收租及管公产吃饭，也是不对的。欠了公家的谷，当然要还。暂时还不起，以后慢慢的还是要还。而且以后再不能靠管公产吃饭了，也必须自己作田吃饭。以后他们自己作田吃饭，也才给我们以光荣。他们现在的困难，也是他们自讨的，不能怨恨别人。

中央已决定今年秋后分田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七哥（即恶霸地主分子刘作衡）大概要算富农，所以他家土地和财产可以不动，不会受什么损失。六哥（即刘云庭，富农分子）家过去也主要不是靠收租吃饭，而是靠雇请工人种地吃饭，他自己也劳动，所以大概也算富农，所以他家大概也不会动。以后作富农，雇请工人种地，自己也种地，这是可以的，合法的，不会受到大的斗争的，所以你们及其他的人家还可以雇长工短工作事，以帮助他们进行生产。六嫂（即刘云庭的老婆，富农分子）今年雇人种田是好的。四嫂（即刘少奇的大哥刘墨钦的老婆）亦可雇人种田。这样，乡下找工作的人才有工作，你们也可以过活。七哥家要雇人也是好的。因为允许雇人种地，对穷人也是有好处的，故可告诉乡下的亲故们：为了进行生产，尽可雇请长工和短工，讲好工钱，订好合同，以后按合同待遇工人，就不会有问题。

我回这封信给你，还是为了你们好，你们必须听我的话，老实照办，否则还是要讨苦吃的。对于过去，你们必须认错，请求农会原谅和教育你们。

刘少奇 五月二日

附 件 二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刘少奇给
刘作衡、刘尊邦和刘秀林的信

作衡七哥并奠邦、秀林：（按：奠邦是刘墨钦的儿子，富农分子，解放后，在刘少奇的庇护下，钻进湖南省参事室任秘书；当地贫下中农对此事极为不满。刘秀林是刘墨钦的女儿。）

你们的来信，都收到了。乡下土地改革正进入高潮，这是很好的事，你们应该赞成，不应反对。同时，你们应该小心谨慎，不要被地主欺骗。你们家的成分，应由农会大家评定，

不要和大家争吵。听说三家都评定为富农，这也是有道理的。莫邦家因不种地，出租土地，虽生活不好，人家亦评为富农，但以缺乏劳动力为理由，或可请求定为小土地出租者。六嫂（刘云庭的老婆，富农分子）和四嫂（刘墨钦的老婆）家如不定富农，亦应定为小土地出租者，而不能定为中农和贫农。这些事，你们应完全服从农会决定。听说七哥到长沙开窑厂（刘作衡当时任窑厂董事长，雇工一百多人。）如老实作这种事，是可以做的。但绝不要掩护乡间地主到城里住，到厂里作工作，不要替地主藏一点东西，也不能接受他们一点送礼，如不注意这些，农会就会来找你的麻烦，你如有这些事，应即认错，把东西全拿出来。秀林家的情形我完全不清楚，如果也是小土地出租者，可请求农会留给你一些土地和房屋，如果不是那就难说。总之，也请求农会公平决定就是。张宏日（刘秀林的丈夫，旧职员）在天津听说不安心作事，和别人吵闹，要去学习。但他有许多小孩。不作事，就不能养孩子，所以他不能去学习。我很不赞成他。又刘允良来信要来北京，我不知他读了多少书？他读书太少，不能来北京，以在乡间参加工作，参加农会或合作社工作为好。

七嫂（地主婆）的病好些吗？甚念！以前你帮助我很多，很感谢你！望你安心修养。

四嫂、六姐、七姐问好。小孩子们在读书的都很进步，都是最优秀，你们放心。

刘少奇 一月十七日

附件 三

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日刘少奇给黄端生、 成敬常两同志的信（节录）

（按：黄端生是下中农，成敬常是贫农。刘少奇在这封信中，装腔作势，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欺骗了不少贫下中农。但是，只要把这封信和前两封信对照起来看，我们就会看出刘少奇是一个多么虚伪的家伙，他的两面派手法是如何的狡猾，如何的毒辣。现在我们把这封信摘要公布于下。）

黄端生、成敬常两同志：

……

双狮岭煤矿据说由宁乡县政府接手，准备开办这是很好的。但齐海湘同志有些想法似乎不很好，他最近同刘登侯（刘作衡之子，地主分子）来到北京一次，因为他同地主混在一起，我没有见他们，并要他们立即回乡，向乡政府承认错误，不知他们回到乡下以后怎样？刘作衡、刘登侯以及还有我的一些亲戚，他们都是地主，历来不做好事，并且做了一些坏事，农民反对他们是完全有理由的，我也历来同他们不对，他们也历来不听我的话，但刘作衡不知经过什么门路，在长沙一个什么机关，钻营到了一个秘书名义。此事以前我不知道，听说后，我觉得不好，即告湖南统战部处理，但至今似乎还没有处理。我有一些亲戚以前也常来信，但他们所说情形大部是假的，我很少以至最近完全没有回信给他们，所以现在他们也不再来信了。但不知齐海湘同志为什么同他们混在一起，至今没有同他们分清界限。……。

刘少奇 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日

附件 四

刘少奇的一首黑诗

(按：一九二一年左右刘少奇寄给他的拜把兄弟洪赓飏一张照片，照片的背面就是这首诗。这首诗真实地描绘出了刘少奇自己的丑恶灵魂，可以说是刘少奇的自述，很值得一读。)

原诗：

身长七尺好奇男，
汝何悲愤而长忆？
尔之命促数且奇，
一生富贵何可期。
胡不及时以行乐，
飘零千里，备罹万难欲何为？
人才西渡正纷纷，
尔之翘首望何陲？
岂欲长征班定远，
杖策以相随。
满目带秋思，
意蠢情亦痴。
天津桥上无人识，
只得远寄与知己。

赓飏仁兄存 刘少奇

附件 五

刘少奇给湖南省省长王首道的一封信

首道同志：

我的七哥刘作衡由北京回家，路经长沙，请你招待数日，他即自行回家。据他说乡下征粮有一些过重的，交不起，这恐不完全是地主的叫嚣，有加以考虑之必要。又我六哥家中因无劳动力，他儿子出来参加工作十余年，不能顾家，现家中老小数口要吃，亦交不起粮，不知有无办法减少。又我七哥有一个孙子，想到长沙学校读书，不知是否有免费的学校给他入学，如有，望给以帮助，麻烦之处，望予原谅。

此 致

刘少奇 十二月二十四日

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彻底清算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

最高指示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哪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

×

×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问题暴露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这对提高全党的毛泽东思想水平进一步巩固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和全国的统治地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极为深远的伟大意义。

解放以来，我党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十七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战胜刘少奇的反动路线的胜利。

现就我们手头所有的材料，将刘少奇所提出的修正主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揭露如下：

第一，解放战争时期，害怕革命，害怕胜利。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是中国解放战争转折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毛主席提出：战争进程，比原来预计，大为缩短。现在看来，只需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在这样的形势下，毛主席一再教导全党全军要再接再厉、艰苦奋斗、不怕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敢于胜利，争取迅速胜利。

然而刘少奇在这样大好的革命战争形势下，目瞪口呆，害怕胜利，一反常态。他在一九

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却说：“现在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容工作。”

当时处在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重重压迫和剥削，他们巴不得一下子推翻国民党反动的统治。而刘少奇在胜利面前惊慌了，企图拉住革命战争的车轮不前进或缓慢前进。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与情绪。

第二，在三大改造中，企图扭转社会主义方向，幻想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

1. 把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曲解为新民主主义时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革命与政权的根本转变，标志着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主席把这个时期称作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的基本矛盾，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必须强化，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可是刘少奇不承认过渡时期是社会主义阶段，而把它歪曲成新民主主义时期。他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现在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时期。待十年建设后，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主义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出过早。”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时期，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早已提出来了。可是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宪法草案的说明报告中，却公然说：“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

在这里，刘少奇的思想是一目了然的。他公然宣传什么解放以后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说什么在这个时期里，社会主义问题是将来的事情。这不是露骨的资产阶级思想又是什么？

2. 主张保护富农经济，发展农村资本主义。

解放以后全国进入了一个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为了恢复农村生产，毛主席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中央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指出：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由解放前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是毛主席的伟大策略思想。

然而，刘少奇却把保存富农经济看成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同毛主席的思想相对立。他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政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采取的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要保存富农经济。只有到了这样一种条件成熟，以至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的了。而这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

在这里可以看出：一，他把过渡时期看成是新民主主义阶段；二，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都要保存富农经济；三，在农业机械化之后，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没有必要；四，不是采取革命手段消灭富农经济，而是用机械化的方法，自然而然的代替富农经济。很清楚，刘少奇完全是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积极主张在整个过渡时期保存富农经济，发展农村资本主义。这是彻头彻尾地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3. 反对三大改造运动，抵制社会主义革命。

土改以后，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合作社。毛主席对这些新的事物百倍爱护，积极帮助发展。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央做出决定要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促进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可是刘少奇对这些新事物，却采取了老爷式的态度，大加指责批评，如他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有些同志认为农村可以依靠互助组、合作社，代耕队实行农业集体化，实行农业社会主义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农村要实行社会主义，如没有工业的发展，不实现工业化，农业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又如他在一九五一年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会上指责报上报导山西省出现的初级社是社会主义的萌芽。他说：“几个合作社不能算合作社的萌芽。要合作化，必须象苏联一样，一大片一大片的。要搞合作化，条件不成熟。”在刘少奇看来，在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上，在落后的几亿农业人口的中国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必须得先有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没有机械化，不可能有农业集体化。这同毛主席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先搞农业集体化，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批判了他的这种错误思想。毛主席说：“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一九五四年以后，全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渐进入高潮。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刘少奇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如他在“宪法草案报告”中说：“把十条第一款改为国家依靠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这一款里的其他资本，是指资本家的除生产资料以外的其他形式的资本，例如商业资本”。宪法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但他在宪法草案报告中却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并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来逐步实现。”

4. 积极推行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发展资本主义。

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刘少奇要想扭转社会主义方向保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思想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借口苏联经济搞糟了是因为计划经济搞多了，而积极提倡在我国执行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以发展资本主义。

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他指示杨献珍、侯维煜党校如何进行整风时说：“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只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只讲究计划经济，因而搞的很呆板，没有多样性，灵活性。”“社会主义经济是各行各业多种多样的。只搞计划没有灵活性，没有多样性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比资本主义经济搞得更更多样，更要灵活。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灵活性，多样性，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

刘少奇怎样搞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呢？他说：“要利用、限制自由市场，私商钻社会主义的空子。不仅商业有自由市场；还有工业上的地下工厂。另外还要利用农业上的家庭副业、自留地。我们要允许有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工业、地下工厂。要让他们钻空子，当它一钻空子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立即跟上去。你钻空子搞这一样，我跟上去抢一部分，也搞这一样。他钻几十万样，我们社会主义也跟上去，搞它几十万样。”他说：“你

们回去要大声疾呼地提倡大家注意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

在这里，刘少奇完全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他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呆板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大；他公开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要允许保留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商业、工业甚至允许保留投机倒把的地下工厂；他提倡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竞争，自由发展。他的这一套，完全是反社会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为已失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产阶级效劳，妄想恢复已失去的资本主义阵地。

第三，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

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运动，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基本胜利。接着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同年三月十二日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讲话，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论断是正确的，可是刘少奇呢，完全同毛主席唱反调，反对毛泽东思想。

1. 他认为三大改造以后，阶级斗争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解决了。他在1956.9.5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时间。”

1957.4.27，他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明确说：“现在国内敌人已基本被消灭，地主阶级早已被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被消灭了，反革命也基本被消灭了。我们说国内的主要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那就是说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当革命没有胜利的时候，我们用革命斗争来考验。以后革命斗争没有了，社会主义改造没有了，那个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那些事情却用不着了。”

在这里，刘少奇完全违反毛主席的思想，他极力把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观点歪曲和捏造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斗争。”完全抹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抹杀了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抹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其目的，不过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斗争就是了。

2. 他认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解决了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毛主席一再指出：“农业合作化以后，在农村仍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合作社建立了，还必须经过许多斗争，才能使它巩固起来。巩固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

然而，刘少奇认为：“由于党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联合中农的方针，由于中农看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无望，广大的中农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终于防止动摇，积极地要求入社了。”（八大的政治报告）事情的发展完全与刘少奇的想法和提法背道而驰。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但继续存在，而且一起一伏，有时相当严重和尖锐。我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不断进行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断地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打击资本主义复辟活动，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逐渐巩固和发展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如根据刘少奇的想法，中农没有什么动摇了，一部分农民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不存在了，这样农村就万事大吉，不要搞什么阶级斗争，只抓生产就行了。如此下去，不要多久，农村就会变颜色，资本主义就要复辟。

3. 他认为资产阶级本性改变了，号召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指出：资产阶级的本性不会改变的，但只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或者资产阶级接受这个政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会变成对抗性的矛盾。可是刘少奇则认为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就不会有矛盾，他会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根本看不到它的反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他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这个政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和这些步骤，不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且资本家也找不出任何一个站得住脚跟的理由来拒绝或反对，现在已经可以断定，除开个别的顽固分子想反抗以外，在经济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逐步转变为名符其实的劳动者，是绝大多数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能够做到的。”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极力吹嘘资产阶级的特长和对国家的贡献，说什么“资方人员，富有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他们了解消费者的具体需要，熟悉市场的情况，善于精打细算。”说什么，“解放以后，他们接受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甚至说什么在过去几年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参加了支持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的斗争。”从而“孤立了敌人，增强了革命力量。”他在1957年4月向上海党员干部大讲：“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已经把工厂交出来了，除了极少数分子以外，他们已经不愿意反抗社会主义，有很多人已经接受社会主义了……，今天的资本家是新式的资本家了。因此，刘少奇号召党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搞好“联盟”，搞好“关系”，要向他们学习。他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的工作，除开向他们进行教育以外，还必需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把他们有益的经验 and 知识，当作一分社会遗产继承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要继续和改进同他们的合作关系”，“通过这种联盟（即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对他们继续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完全抹煞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大讲团结合作，不讲阶级斗争，放弃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阵地。

4. 他认为“革命战争”的任务已经结束了，现在是需要“完备的法制时代。”

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讲：“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政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需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需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地出来加以干涉。”

在这里，刘少奇完全断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全胜利，“革命斗争任务已结束了”，“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不需要了”，“现在需要的是完备的法制”。阶级区别也不必要了，对待一切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却一视同仁等等，这些思想实足表现了“全民国家”的腔调，

取消革命，取消斗争，取消人民群众运动。这同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毫无区别。

5. 他主张要用“缓和”“妥协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1957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光辉著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武器。然而刘少奇却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毛主席指出：在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却长期存在，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在我们国家，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但也有可能发展为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因性质不同，解决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采用专政的手段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民主的方法，也就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解决。刘少奇有意歪曲主席的思想，1957年4月，他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讲话说：“处理敌我矛盾要强调斗争性，使矛盾紧张起来，使斗争激烈化，以致使矛盾的对方压倒消灭。如果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强调同一性，而是强调斗争性，使人民内部矛盾没必要地紧张起来，激化起来，在人民内部造成紧张局面，那就是错误的，那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错了。”“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缓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事情应该妥协解决，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它自来就是同一性。”在同年五月，他同杨献珍、侯维煜谈话也提出：“处理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要采取你死我活的办法来解决，处理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就不要采取你死我活的办法来解决，可以用妥协的办法来解决。”

在这里，刘少奇根本违反了毛主席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思想，割裂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宣传处理敌我矛盾强调斗争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同一性，强调妥协。他这样讲的实质，就是否认人民内部有阶级矛盾，有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阶级妥协，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本质是革命的、批判的。没有斗争就不成为矛盾，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解决任何矛盾都必须经过斗争。刘少奇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妥协办法的理论，是十足的修正主义理论。

第四、1962年抛出了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逆流。

在1960至1961年国内国际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由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暂时困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的时候，作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刘少奇，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进行坚决的斗争，打退他们的进攻，相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和措施。从而支持和助长了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1961年9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中央关于全党干部轮训的决定”，这个决定歪曲了党内思想斗争的原则，错误地提倡什么自由思想，自由讨论，“三不主义”而不讲思想斗争，这样就为资产阶级思想大开绿灯，使那些对党不满分子，公开的、合法的肆无忌惮的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又抛出了一篇修正主义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里，大肆攻击三面红旗，竭力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认为我国出现的暂时的经济困难，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所造成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攻击59年反右倾斗

争是“过火了”，反右斗争本身就是错误的，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污蔑党内缺乏民主，党的生活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攻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接着他又在62年5月批转了一个更为错误的“中央财经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竭力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对形势作了极为悲观的估计。

这些报告和文件在全党都做了认真的传达和学习讨论，影响很坏，造成了党内思想混乱，使不少同志一时迷失了方向，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掀起了一股“单干风”和“翻案风”。高级党校一小撮反党黑帮，杨献珍、王从吾、侯维煜就是在刘少奇报告的号召下，大闹“单干风”和“翻案风”，他们抓住刘少奇的报告，捧为至宝，组织学工人员花费一两个月的时间去反复学习讨论提意见，为杨献珍闹翻案，把高级党校闹的乌烟瘴气，成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1962年9月中央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伟大领袖毛主席适时地做了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揭开了当时存在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提出要在全国城乡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扭转了阶级斗争的形势，纠正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正确思想指导下，阶级斗争形势很快就起了变化，工农业生产迅速得到发展，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和英明伟大正确。

第五、提出“形左”实右的四清路线和毛主席的四清路线相对抗。

1963年5月，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提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路线和政策，它是我党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根本纲领，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献，全党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决定（草案）”的精神指导下，全国农村蓬蓬勃勃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狠狠地打击了城乡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做了一个“关于社会教育问题”的报告，于1964年9月泡制了一个“形左”实右的“农村社会主义的几项政策规定”（草案）同毛主席所制定的“决定”（草案）相对抗，这个报告和“规定”（草案）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报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报告。

1. 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把农村形势说得漆黑一团。

毛主席在“决定”（草案）中指出我国农村形势是越来越好，在大好形势下，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可是刘少奇对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却做出了极为错误的估计，过分的夸大了阶级敌人的力量，他在报告里说：“领导权掌握在敌人手里的，我看在全国最少有三分之一。”“现在有的少数地区土改不彻底，华北有三分之一，西北几乎都是和平土改，地富统治并没有真正打倒。有些单位敌人打进来，拉出去；有些单位领导人，同地富资本家搞在一起，搞和平演变”，他说：“你下去后，一开始优势在他们方面，不在我们方面，因为他们有组织准备。”

“那一年，我到湖南去扎根串联，就被赶走过，……，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去的，他们还赶我，你们去会不赶吗？”刘少奇完全抹煞了我党十五年来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成绩，把社会主义国家描绘成敌人统治的天下，歪曲了客观事实。

刘少奇在报告中大肆吹捧敌人，贬低我们的干部和革命群众。他说：“过去多次运动中，阶级敌人摸熟了我们有几套方法，甚至有的地方，阶级敌人研究党的方针、政策比我们

党员还研究得好、记得熟”，“现在阶级敌人变聪明了，他们很会搞秘密工作，搞合法斗争，他们比我们还会搞的”，相反，刘少奇对党领导下的干部和工作都说得一无是处，他说：“我们过去的领导机关长期脱离群众，凭着听汇报看材料指导工作，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从中央到公社党委，如不改变，不要多长时间，我们的工作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过去的四清五反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搞的不深不透，有的根本没有入门还在门外边。”

2. 不是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依靠少数人，搞神秘化的工作路线。

毛主席指出：在四清运动中，要充分发动贫下中农，在斗争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要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逐步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把政策交给他们，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

然而，刘少奇由于对农村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他不相信群众在党的长期领导下，绝大多数都是革命的，有觉悟的。各级组织和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他一再强调，在四清运动中要采取解放前新解放区进行土改的办法，搞什么扎根串联，访贫问苦，搞秘密工作，抛开原来所有干部，抛开一切原来的积极分子，从头做起，把四清运动在较长时间内搞的冷冷清清，只在少数人中秘密活动，结果使运动走了弯路，群众不能在运动中得到锻炼，运动也必然搞不彻底。

3. 错误地估计干部队伍的情况，扩大打击面。毛主席指出：对待干部要一分为二，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问题多的和性质严重的只是极少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注意团结95%以上的干部。

然而，刘少奇却认为所有干部都有问题，许多人同阶级敌人混在一起，因此他主张把干部都应抛在一边，先发动群众。他认为只有先团结95%的群众，才能团结95%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对待所有干部，不是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一律“上楼”“下楼”，人人过关。在经济退赔上刘少奇也主张彻底退赔，从严退赔，不分具体情况，不予区别对待。结果形成运动后期在组织建设上的某些困难。

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给四清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1965年1月党中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四清运动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从而把全国四清运动引导到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去。

第六、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企图抵制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刘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更为突出更为严重，给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

1. 妄图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斗争引上“学术讨论”的歧路上去。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以批判“海瑞罢官”问题开始的。毛主席早就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是一个政治斗争问题，必须批判，但黑帮头子彭真在刘少奇的支持下，搬出了一个“五人小组向中央汇报的提纲”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极力把这场政治斗争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上，指出要整左派的风，打击压制左派力量，这个汇报提纲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纲领。

在这期间刘少奇也积极配合彭真一伙把文化大革命引向学术研究，他说“写文章要慎重，要有高水平，要写出高明的东西，这是打笔墨官司不要辱骂”。

2. 急忙派工作组，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1966年5月中央及时发现并批判了彭真的“汇报提纲”，同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发出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这个通知是毛主席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广大革命师生动起来了，形势大好。刘少奇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下，怕的要死，生怕革命烈火烧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于是匆匆忙忙决定派出工作组，占领各单位文化革命的领导岗位，企图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群众运动引到斜路上去，以扑灭革命群众运动的烈火。同时刘少奇指示有的单位要保护那些反党分子，他说：“要斗也可以斗，但要有材料，要有布置”“要争取第二号人物起义”，指导工作组积极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发动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时被刘少奇压了下去，全国文化大革命又进入了低潮。

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又是毛主席发现并及时地纠正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令撤消了一切工作组，同时发动群众，彻底批判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是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战胜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前进的。

第七、反对毛泽东思想，同毛主席分庭抗礼。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区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自七大以来刘少奇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他同毛泽东思想越来越背离，这是他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堕落成资产阶级在党内代言人的总根子。

1. 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当代创造性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

刘少奇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1948年12月他对马列学院的学员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外国的革命经验，世界的革命经验，马恩列斯的书籍中论中国的只有1%，99%都是讲的外国话，讲的外国事，写的是外国材料，分析的是外国历史。”既要有实际经验，更要有理论知识，既要有中国经验，又要有外国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经验主义者则是爬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普遍真理，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有中国的经验，又有外国的经验，才有实际正确指导的可能。在这里刘少奇把毛泽东思想把中国革命的经验都排除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以外。这种错误的观点，在他的许多讲话和文章中都有表现，如他在1951年6月30日的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讲话中这样说：“全体党员和干部都应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学习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列主义原理，所阐明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学习党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刘少奇更不承认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认为世界各国的革命问题都由马恩列斯解决了。毛主席只是把

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具体运用，没有什么新发展。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向马列学院学员讲话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有世界历史以来无比丰富的，世界上任何大的原则性问题均解决了，如民族问题，工人运动问题，秘密工作问题等等，中国有吃饭住房问题外国也有，甚至城市地皮问题，也可以参考苏联，参考马恩列斯的经验。”在一九六一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四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也这样认为。他说：“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运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工农联盟的理论和农业合作社的理论，总结了我国革命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运用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资产阶级采用赎买政策的思想，运用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中央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吸取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在我国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如此等等，刘少奇从不讲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和新贡献。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这种态度绝不是偶然的。

2. 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鼓吹学习苏修

一九六四年九月，××省委第一书记×××给刘少奇一封信，信上告诉他，省委要求各地委、市委、县委，“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必须认真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负责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这样做本来是正确的，应该的。但刘少奇在给他的复信中却批评说：“这些话不完全正确”。他借口要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来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说：“这里联系到这样一个原则问题，就是我们应当向谁学习，是向党内和党外群众中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管他们的职位高低，还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不管他有没有真理。我们的原则，只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只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接着刘少奇更露骨地公开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攻击全党学习主席著作的运动。他说：“我赞成当前干部和群众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特别赞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口号（这难道只是赞成的吗？在这里，刘少奇是言不由衷，是一种不满情绪的流露）我不反对你号召干部学习第一个十条和毛主席有关讲话，在宣读的时候，你可以加些解释，强调某些段落和语句并联系你们那里的实际，但不是你的创造。”“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接着又说“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犯这样的错误，党内已有一部分干部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刘少奇就是用学习马列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来反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刘少奇对毛主席著作采取如此态度，而对苏修却一贯强调学习再学习。当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面目已经完全暴露的时候，刘少奇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四十周年庆祝会上还大讲特讲苏联的经验，苏联的援助，苏联的科学技术，同时还要求全党“学习苏联和其它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要求发展同苏联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们不禁要问刘少奇，你在这样的时刻，大吹特吹苏修，大讲特讲学习苏修，目的何在？你叫我们向谁学习？走那条路？引向什么方向？

3. 贬低毛主席，同毛主席分庭抗礼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导师，天才的领袖。有了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世界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有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

然而刘少奇却不恰当地估计自己，把自己摆在同毛主席同等地位，分庭抗礼。有时，或明或暗地影射、损伤、毁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誉。如一九五六年九月他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完全否定了毛主席的天才和英明伟大。如何看待党的领袖，他叙述了在过去35年中为什么犯了四次严重的路线错误，而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以来21年中以毛主席为领导的党中央为什么没有犯过错误？他说：“这不能仅仅用历史的长短，经验多少去解释，……也不能仅仅用某个时期领导者个人情况如何去解释。……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这里，刘少奇完全否认和抹杀了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作用。

解放以后，特别是一九五九年以来，林彪同志一再号召全党全军要学毛主席著作，要当毛主席的好学生。然而，刘少奇一九六二年在修改补充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却仅提出：“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来同林彪同志提出的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相对立。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上讲话中，以保护少数为名，竟袒护写反革命标语的学生：“清华有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语，大家要斗他，工作组要保护他。现在看来，说这个学生是反革命的结论，材料不充分”。在这里，我们要问刘少奇：你还要什么材料？谁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当前，不论在国际和国内，拥护和反对毛主席，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结 束 语

根据以上简要历史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解放以来，刘少奇是始终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贯彻着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每当革命转折时期，刘少奇总是妄图在中国扭转社会主义方向，把历史车轮拉向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面前，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他的阴谋总是不能得逞。他在革命的各个阶段一时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一时又表现为形“左”实右，但其实质就是修正主义。解放十七年来，刘少奇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坚持资产阶级革命家立场，他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革命左派，对社会主义越来越敌视；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越来越接近；对无产阶级革命也越来越抵触，从而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就不能不到穷途末路的时候了，我们的革命的同志要决心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中央党校 王 中 郭丕衡

1966年11月7日